

儒家伦理 与现代企业精神 的承接

东亚的崛起与儒家伦理的复兴
儒家伦理蕴藏的内在魅力
儒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21世纪大趋势与儒学的发展
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与儒学的历史命运

陈为民 主编

东亚的崛起与儒家伦理的复兴
儒家伦理蕴藏的内在魅力
儒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21世纪大趋势与儒学的发展
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与儒学的历史命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序

陈为民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是一本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著作，值得一读。

儒家思想对现代化的作用如何？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促进的还是阻碍的？这本是一个老问题，在20世纪60、70年代后，又逐渐成了一个引起更广泛注意的新问题。

基督教文化支配下的欧洲，率先走出了封建主义的暗夜，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迅速发展起来；儒家文化支配下的中国，却长期停滞于封建主义的历史阶段，以致近代在同欧美国家的接触中睦乎其，后，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近代欧洲的发达和中国的落后，同这两种文化的差别有无关系？这一问题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深思。

本世纪初，马科斯·韦伯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他认为：基督教新教的教义中包含着资本主义精神，因而能使欧洲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儒教不包含资本主义精神，所以无助于中国的发展，而只能成为其阻力。

儒家思想支配中国两千年，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儒家本处在嫌疑之地，韦伯的学说为这种说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于是就更加把儒家推上了被告席。

但是，到70年代前后，这一问题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日本在经济方面创造的“奇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一时使儒家思想只能是现代化阻力的说法不攻自破。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处在儒家文化“覆盖圈”之内；儒家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至今仍然深重，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它们能实现经济上的迅速腾飞，又怎么能认为儒家文化是发展和现代化的不可克服的阻力呢？

进入 80 年代后,儒家文化的故乡、历史上受儒家文化支配最深、最久的中国大陆,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到了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地位。拥有 12 亿人口的中国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腾飞于东方,自然会更加引起世人的瞩目。时至今日,儒家文化同经济发展的关系,不但在中国及东亚日益成为热门课题,而且骚骚有越出东亚,成为世界性课题之势。

中国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其责任不全在儒家,而儒家思想自然不无干系;今日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有活力的地区,其功自然不能过多地归于儒家,而儒家思想不无一定的作用。

韦伯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倒立着的:它把文化,尤其是宗教,看作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其实,新教中的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恰恰是经济发展的产物。欧洲的经济的发展,使得在封建时代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基督教教义,同经济发展的要求日益不能适应了。于是,在经济力量的推动下,发生了宗教改革,从而有了包含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而后者又反过来对经济发展起着促进、加速的作用。

韦伯把基督教新教伦理同中国的儒家学说相比,实际上是把两种没有可比性的、不同类的事物相比了:基督教新教是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实现了宗教改革的宗教,而儒学却因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而未曾进行过类似的改革。韦伯说的儒学,诚然是不包括资本主义精神的旧儒学,但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又有什么资本主义精神可言呢?

不过,韦伯的研究有一点是很有价值的,即重视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尤其是在一个社会中长期起支配作用的文化(在欧洲是基督教,在中国是儒学)的巨大作用。这种文化,由于在历史上长期起支配作用,不但体现在各种典籍、文献之中,为人们一代代诵习,而且广泛渗透到广大人群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品味、爱好以及民族感情之中,因而形成为影响人们思想、行动

的顽强、深厚的力量。经济发展是全社会、全民族的事业，不借助于传统文化的力量，把广大人民普遍调动起来是不行的；而要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不依据经济自身的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剔除其反映旧经济的落后性、腐朽性的糟粕，赋予其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精神，也是不行的。

本世纪 60—70 年代以来，过去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的东亚地区，所以会显示出令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发展活力，它至少证明：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活力，不会纯然是消极的。同时也应看到：东亚地区经过多少代的风雨雷霆，经济自身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和起飞的条件，而经济的发展又不断地推动着传统文化的改造，赋予其适应经济发展的新精神、新活力。

认为现时的中国及东南亚地区已完全排除了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当然不是事实；认为传统文化还是未接触西方文化以前的传统文化，儒学还是在历史上长期起支配作用的那种儒学，自然更不是事实。

问题在于：对儒学同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以是或否作回答，而要通过认真的研究，弄清楚东亚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状况，弄清楚经济的发展如何推动了儒学的变化和改造，而经过改造的儒学，又怎样在经济的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一书，就是企图以认真的研究对此问题作出科学分析的一本著作。全书分作三部分：立论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它试图对传统文化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儒学对现代化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以及怎样改造儒学以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等问题，作出理论的回答。实证篇以日本及“四小龙”现代经济发展有关材料为背景，试图总结历史经验，为有关理论提供实证。展望篇则是以立论篇得到的理论认识为导向，并以实证篇总结出的历史经验为依据，对此问题的未来发展和走向作出展望。

此课题所研究的是正处于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事物,材料的不完备,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的不充分,尤其是对此问题的研究有决定意义的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中还处于开始起飞的状况,要想在目前就为此问题求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无疑还是一种奢望。本书的写作,与其说是要对此问题提供答案,无宁说是在提倡一种认真的研究风气,为促进此问题的深入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赵 靖

香港回归前一月

目 录

序 言·····	(1)
----------	-----

上篇·立论篇

第一章 东亚的崛起与对儒家伦理的反思·····	(1)
◎东亚崛起与日本说“不”的轩然大波·····	(1)
◎西方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沉沦·····	(7)
◎“西方病需要东方药”的呼唤·····	(15)
◎韦伯命题的启示与反思·····	(24)
第二章 儒家伦理蕴藏的内在魅力·····	(40)
◎人类的文明史与文明人的历史·····	(40)
◎儒家文化传统源远流长·····	(51)
◎儒学对于现代化是阻力还是助力之辨·····	(70)
◎孙中山“宏且富”的“宝贝”观·····	(80)
第三章 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管理·····	(86)
◎企业管理之本在人,人之本在心·····	(86)
◎儒家伦理的特质·····	(92)
◎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精神的“对接”·····	(104)

中篇·实证篇

第四章 日本式儒教与日本式经营·····	(115)
◎沉浮与变迁——日本经济转型时期的理念变革 和儒学的命运·····	(116)

◎日本式儒教——儒家文化与日本传统民族性的磨合	(122)
◎“日本式经营”的蕴涵	(133)
第五章 日本现代企业精神与儒家传统	(150)
◎“和而不同”与“国益至上”	(150)
◎“企业即人”管理思想的内涵、运作及其根源	(171)
◎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塑造	(186)
◎日本式经营的启示、评估与借鉴	(199)
第六章 儒家思想与“四小龙”的经营管理	(206)
◎儒家资本主义——新儒家伦理的提出	(206)
◎儒家文化——“四小龙”共具的文化背景	(219)
◎儒家文化熏陶的经营思想	(243)
◎儒家文化在经营管理中的作用及其演变	(258)
◎“东亚模式”对建立中国式管理的启示	(264)

下篇·展望篇

第七章 企业精神——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	(268)
◎现代企业精神的内涵和功能	(268)
◎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	(276)
◎高扬职业道德建设的大旗	(283)
第八章 中国企业精神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289)
◎近代实业家创新的企业精神	(289)
◎企业精神与中国革命建设传统	(298)
◎振兴中华的企业精神	(304)
◎老字号“同仁堂”的启示	(314)
第九章 关于企业精神的构塑与传统文化的开发	(323)
◎开发传统文化的思路	(323)
◎企业文化与中国文化传统	(332)

第十章 21 世纪中国儒学的历史命运	(344)
◎21 世纪大趋势与儒学的发展	(344)
◎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与儒学的历史命运	(354)
后 记	(361)
参考文献	(362)

上篇·立论篇

第一章 东亚的崛起与对儒家伦理的反思

自本世纪 60、70 年代以来,东亚地区日本的崛起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令世人瞩目。冠以所谓“儒家资本主义”的刮目相待,“东洋奇迹”的赞叹及其奥秘的探寻,“西方病需要东方药”的呼唤,接踵而至。东亚经济的振兴,西方经济发展的困境,促使人们对儒家伦理开始认真地加以反思与重新予以审视。

◎东亚崛起与日本说“不”的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东亚日本及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都是面积狭小,人口稠密、资源贫乏、市场有限或半岛或海岛型国家或地区。本世纪 60、70 年代,日本首当其冲,“四小龙”紧随其后,经济上取得了惊人发展,引起了举世的关注。日本战后经过二十多年的时间,以惊人的速度一举追赶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据统计,1961 年至 1985 年的 25 年间,“四小龙”的平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9%。据《澳门日报》报道:1995 年人均 GNP,日本 41513 美元,新加坡 25981 美元,香港 24043 美元,台湾 12441 美元,韩国 10224 美元。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突飞猛进的诸多原因中,一个令人值得

深思的现象，是日本和“四小龙”都处在中华文化的辐射圈内，都与儒家伦理有着不解之缘。儒家文化重视人生地位的世俗入世特征，重视群体和谐本位，重视修养教化，提倡勤奋刻苦，提倡兼容及克俭等价值观取向，与东亚企业精神及企业管理模式的形成，是息息相关的。

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成功，对于不可一世的美国，既是挑战又是诱惑。尤其是日本企业中人际关系的亲和性、微妙性，令西方人士百思不解而惊叹不已。

在东亚经济的崛起中，回顾一下日本全面赶超美国的足迹，揭示日本由仰承美国的鼻息，到“日本说不”的戏剧性转变，是有必要而发人深省的。

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作为战败国，社会经济千疮百孔，国土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危机重重。当时任日本占领军同盟部队最高司令官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曾以轻蔑地口气评议说，“日本人好像12岁的儿童”，“如果说美国文化是大学生的话，日本文化充其量是个小学生”。对此，虽有广泛地报道，但日本举国上下既无辩论之声，更无敢于抗议的表示。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40多年过去了。日本不仅敢于对美国说“不”，而且，还敢于以轻蔑地口吻评议美国了。中曾根以首相身份曾在自民党干部会上说：“美国有黑人、波多黎各人、墨西哥人，所以知识水准比日本低。”此言一出，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然而，日本国民的舆论表示支持中曾根的讲话，认为言之有理，符合实际。而后，还有以日本人的优越感认为美国人不够勤劳的声调泛起。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般戏剧性的变化呢？

众所周知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创造了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不仅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而且是金融大国、债权大国、技术大国。经济实力强了，腰杆硬了的日本不再甘心于受山姆大叔摆布了。为了追求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日本的政治家常常以

“失言”的方式，急不可待地表达自己的心声。

日本从 50 年代后期直至整个 60 年代的期间，维持了每年近 10% 的高经济增长率。1950 年，日本人均 GNP 只有 123 美元，不足美国的 1/12。1989 年人均 GNP 超过 1 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根据 1990 年 12 月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其顺序为瑞士、日本、芬兰、瑞典、美国、西德、法国、英国等 19 个国家。其中日本为 23296 美元，超出美国 3569 美元，已居七个发达国家中的首位。人口只有美国的 1/2，面积只有美国的 1/25 的日本经济实力，已接近于美国的 2/3 了。战后，美国外贸大量顺差，日本几乎年年逆差。80 年代以后，美国的外贸逆差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最高外贸逆差高达 1600 亿美元，而日本的外贸顺差最高达 1016 亿美元，其中 2/3 是对美国的顺差。1988 年，美国外债达 5325 亿美元，沦为最大的债务国；而日本则成为拥有近 3000 亿美元债权的最大债权国。日本四大证券公司在海外的投资额，已超过美、英、德三国证券公司的总和。1989 年，日本在海外的直接投资额达 442 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近年来，日本在海外的企业兼并之风，愈刮愈烈。1993 年，对联合国预算的认捐额，美国分担率为 25%，日本为 12.45%。日本以此“国际贡献”，作为提高日本国际地位与改善日本人国际形象的策略，并视为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筹码和捷径。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已是当今日本政界人物梦寐以求的目标。

与战后 60、70 年代日本经济奇迹般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经济不断地走下坡路，企业经营陷入困境，劳动生产率裹足不前，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日趋下降。美国面临在科学技术、产地、贸易、金融等各个领域来自日本的严峻挑战。美国经济“由盛而衰”，是从 70 年代初开始的。自此，日美经济走势的显著反差，更加引人注目。战后日本经济“由弱变强”，飞速发展迎来了奇迹般的“景气”时期。1955 年至 1960 年，日本产业的综合生产指数增长 31 倍以上，农业获历史上空前的大丰收。日本人将 1955 年～1957 年

称为“神武景气”时期，将1958年～1960年称为“岩户景气”时期。“神武”是日本第一代天皇的名称，而“岩户”在日本的传说中，则是皇室祖神，即创立日本国家的“天神”的名称，以此命名表示史无前例的繁荣之意。1965年～1970年，在“神武”、“岩户”景气的基础上，出现了日本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景气时期，借用神话故事中创造日本的又一神名“伊奘诺”，史称“伊奘诺景气”。这一景气时期，日本国民总生产每年同上年相比以2位数增长，创造了战后超高速增长经济的奇迹。

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兹拉发表了《日本名列第一——对美国的挑战》一书，这一令美国人胆寒而痛心的惊呼，正是日美经济形成鲜明反差的舆论反响。

回顾战后日美经济的发展，日本后来居上、咄咄逼人的经济实力，足以使自认不可一世、惯于发号施令的美国当局坐立不安了。“日本第一”的惊呼，日本敢于说“不”的挑战姿态，在美国公众引起轩然大波。在日美的经济较量中，日本人步步紧逼，甚至唯旗必夺的气势，令美国的大亨们生畏。

日本在战后最初出口的也只是玩具、杂货、低档纺织品等廉价品。最早打入美国的电视机、轿车，被美国产业界同行们不屑一顾地视为“玩物”。“东方小日本”的牢固观念，使傲慢的美国人无法想象，在美国所占据的市场领域，会遭到滚滚而来、势不可挡的日本产品大潮的冲击。

1949年，日本政府发表的技术白皮书认为，日本的工业比起美国，技术上落后20年。面对这样的不利局面，对于技术发明是自己“干”还是“买”专利的历史性抉择之间，日本人选择了后者。欧美企业卖出技术专利，当一笔笔丰厚的专利，成交费落入腰包而喜形于色之际，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极其宝贵的专利技术，在日本人手中就像变戏法似地不断变幻，最后却变成一支支杀向自己的回马枪，令欧美人后悔莫及。

从欧美大量引进的技术专利,奠定了日本战后经济迅猛发展,实施追赶欧美战略的基础。与引进的大量技术及其产生的巨大效益相比,日本人付出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战后 20 年间用于引进技术的费用累计约 170 亿美元(折合日元 3 万 4000 亿),这笔费用远不及当今美国一年投资于研究开发的金额。

战后,日本赶超美国的速度和魄力是十分惊人的。50 年代,日本造船业就实现了巨大钢制预制块焊接式新技术的突破性革命。60 年代初,在焊接和钢材方面不断取得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日本的造船技术终于达到了凌驾于美国之上的水平。60 年代中期,日本赢得造船业世界市场占有率的 50%。这一霸主地位一直保持到 80 年代中期。60 年代中期,美国拥有钢铁业引以为自豪的劳动生产率。美国 100 工时平均生产 7 吨钢,比当时日本高出 2 吨以上。然而,80 年代日本在迎接石油危机挑战,大力节约能源的技术改造中,使连续铸造能力占到全部铸造能力的 80%,而美国只占 20%;日本 60% 的高炉容积超过 2000 立方米,而美国则不足 10%。自此,日美钢铁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逆转形势。日本的劳动生产率是 100 工时生产 9.5 吨,美国只有 8 吨。日本的钢铁价格比美国低 15~30%,日本钢铁以迅猛之势打入了美国市场,迫使美国政府出面交涉,在某些钢铁品种上,冻结日本产品在美国市场上的占有份额。日本汽车工业的发展速度更是令人瞠目结舌。1955 年,日本仅仅能生产 90 多万辆汽车,其中小轿车不足 15 万辆,大量的是卡车。这时日本汽车工业的生产规模还不到美国的 1%。而后,日本汽车产量以令人眼花缭乱之势激增起来。1965 年 190 万辆,1970 年达 530 万辆,列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1980 年首次超过美国达 1100 万辆,从而登上首屈一指的世界汽车王国宝座。1992 年,日本厂家在美国生产的汽车总数就已达 230 万辆。日本汽车工业以“有路必有丰田车”的豪迈气势,以无可争议的优势占领着美国的市场。

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日本更是雄心勃勃。半导体收音机的生产技术、产业机器人的生产技术等，日本从美国引进之后，在开发应用方面迅速获得成功。60年代初，日本就成功地主宰了美国的半导体市场。以半导体收音机为突破口，日本又成功地打入了录音机、电视机市场。而后，日本的日立、东芝、松下、夏普又势不可挡地征服了美国的录像机、激光唱机的市场。日本卡西欧的新型电子计算机，佳能复印机，美能达名牌相机等也迅速占据着美国的市场。1950年，美国政府分别对原子能委员会和代号为“空军研究项目”的机构，拨出巨额资金，开展产业机器人的研究。当年，利用该项研究技术，首次向市场推出了第一个产业机器人。然而，开花在美国的机器人技术，被引进的日本却培育出举世公认的硕果。产业机器人的产量、产值、技术水平均已居世界首位。

80年代中期，日本的录像机、激光音响的市场占有率已达95%，复印机达85%，产业机器人为70%。日本已经实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光导纤维、激光半导体、碳素纤维、激光电子音响等高科技产品的批量生产。在计算机软件、宇宙航空及通讯等尖端技术方面，日本仍比不上美国之外，众多高科技领域日美或并驾齐驱，或日本略胜一筹了。进入80年代，日本实施由技术的“引进开发”向“独创开发”的战略转移，高扬起“科技立国”的旗帜。不难预见，在未来高科技制高点的激烈竞争中，日本民族将发扬创造性技术引进开发的优良传统，在独立自主创造性技术开发的历史进程中，奋力攀登，力争在更多的高科技领域独领风骚。

“日本第一”、日本敢于说“不”的轩然大波，迫使欧美人士在震惊之余，不能不陷入深深地思考与自省。在欧美人士看来，日本作为东方文明圈的一个小国，战后短短的数十年间，竟创造了赶超欧美的经济奇迹，这一惊人的历史进程确实充满了神奇的色彩。人们对日本和“四小龙”成功“奥秘”与东方文化关系的思考，自然成为一个十分关注的问题。

◎西方资本主义道德文化的沉沦

伟大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以一种对资产阶级近乎赞美的语气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起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马克思进而指出，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中，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充分地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与此同时，马克思尖锐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也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总之，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

资本主义文明的善果与恶果如同孪生兄弟同时降临到人间。

一、美洲新大陆与淘金热

早在西方资本主义萌发的曙光时期，西欧上层社会就弥漫着

一种拜金狂热。为了寻求财富，满足掠夺财富的欲望，自 15 世纪起，两百多年间，西欧的许多冒险家奔向茫茫的大海，实现了多次永载史册的远洋航行。他们先后到达了西非、东非沿岸及非洲最南端，到达了亚洲以及他们前所未知的美洲，完成了环绕地球的划时代的航行。这些航行充满了传奇色彩，同时也是对财富的殖民掠夺。其中最著名的航海探险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和麦哲伦环球一周的航行。

意大利人克利斯托弗·哥伦布(1451 年~1506 年)早年曾从事航海。继葡萄牙人迪亚士于 1487 年航行直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之后，哥伦布认定由欧洲西航可以达到印度，他向西班牙国王提出西航印度的计划。由西班牙国王资助三只帆船和大部分航行所需费用，授哥伦布以海军大将头衔，并预封为新发现土地的世袭总督，土地上的一切财富，扣除费用外，十分之九归西班牙国王，十分之一归哥伦布。经过此番商定，于 1492 年 8 月，哥伦布率三只帆船，百余名水手，自巴罗斯港出发远航。经过 70 多天的艰苦航程，到达了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接着又到达古巴和海地。1493 年 3 月回到西班牙。以后，哥伦布数次前往美洲，他自认已经到了印度，称当地居民为印度人，美洲印第安人一词由此而来。15 世纪末，另一个意大利商人阿美利哥前往美洲，在游记中肯定美洲不是印度，而是发现的“新大陆”，后来沿用阿美利哥的名子命名这块“新大陆”为阿美利加洲，简称美洲。

1517 年，葡萄牙贵族麦哲伦(1480 年~1521 年)游说西班牙国王，提出向西航行也可到达菲律宾西边的达摩鹿加群岛，并依照哥伦布大致相同的条件，得到西班牙国王的赞同与资助。1519 年 9 月，麦哲伦率 5 只船，265 个水手，从西班牙出发，渡过大西洋，沿巴西海岸南下，次年 10 月到达南美洲南端的海峡，即后来的麦哲伦海峡。经五个星期穿越了海峡，船队进入浩瀚的大洋，当时正值它风平浪静，所以称它为“太平洋”。在太平洋上船员经受了粮食断

绝，甚至被迫以木屑、老鼠为食，许多人患上坏血病，相继死亡的极大困苦。历经3个多月的航行，1521年3月，终于到达了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干涉岛上的内政，被当地居民所杀。船队继续西行，1521年11月初到达摩鹿加，满载香料后，船队经印度洋，绕过非洲，于1522年9月回到了西班牙。这次航行证实了地球是球形的科学假说。参加这次环球航行的水手仅有18人生还。

哥伦布对黄金的赞叹，揭示了西欧冒险家远航探险的根本动机和原因。他在给西班牙国王的信中写道：“黄金真是一个奇妙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

17世纪初，首批从英国出发满怀发财梦的移民前往北美洲。他们在拥挤不堪的帆船上，需要航行6到8个星期，其航程中的艰苦与肮脏的程度是令人几乎难以置信。最初的英国移民和其后几十年陆续移民到这里的欧洲人，都是紧紧地依附在大西洋沿岸的平原上。

18世纪前，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1775年，这些殖民地人民发动了反对英国殖民地统治的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殖民地人民在13州起义部队总司令乔治·华盛顿（1732年～1799年）的领导下，发表了著名的“独立宣言”，宣布成立美利坚合众国。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英、美签订巴黎协定，英国被迫承认13州殖民地独立。1787年，华盛顿主持了费城会议，通过美国宪法，成立联邦共和国。1789年，华盛顿当选为美国的第一任总统，成为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的奠基人。而后的岁月，美国的疆土不断推进和扩张，1803年从法国购得位于美国中部广大地区的路易斯安那；1819年从西班牙购得佛罗里达，1845年侵占墨西哥的得克萨斯，1848年对墨西哥战争结束后，得到了新墨西哥、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等地。1853年又从墨西哥夺取了位于今亚利桑那州南部和新墨西哥州西南部的一块土地。1867年向沙俄购买